

4

五經與太學

太學建於元朔五年（公元前124年），是漢武帝的文治措施之一，教學側重於德育，內容為儒家的五部經典：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易》和《春秋》。太學的設立創造中國教育史的兩大先河：首先，它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官學；其次，太學的考核機制與仕途掛勾，只要通一經便可任官，這種模式對隋唐的科舉制度影響深遠。因此太學無論是在兩漢，還是對於後世的影響，都是非常深遠的。

我們可以從文化史角度切入認識太學，第一部分會先簡介五經內容，繼而從兩組文物：海昏侯墓竹簡以及熹平石經入手，探索「五經」在兩漢的地位。第二部分將探討太學系統的運作，帶出兩漢興衰與太學的關係。

五經

許多漢代出土的文獻材料及文物都有「五經」相關的字眼，比如海昏侯墓出土了不少「五經」的竹簡，熹平石經則列明「五經」的內容，兩組文物均體現「五經」在兩漢風行及其廣泛影響士大夫階級。在具體探索這兩組文物之前，我們更宜先了解「五經」到底是甚麼，以及兩漢的政府和士人推崇五經的原因。

甚麼是「五經」？

「經」即經典，「五經」是五本儒家的經典著作：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易》和《春秋》。它們是漢代官方認可的教授材料，用於太學課程。董仲舒¹認為時下書籍「諸不在六藝²之科、孔子之術者，皆絕其道，勿使並進」，因此提倡「罷黜百家，

獨尊儒術」。由於學習「五經」是開啟仕途的第一步，此舉令儒家地位提高，成為正統，更促進了社會的學習風氣，開啟中國士人的經學傳統。

五經的作者

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易》作者不明，或是「三代聖王」³，或是他人，孔子之世以前已有之；至於《春秋》，孟子則認為乃孔子所作⁴。這五本書是春秋時期貴族階層的教材，孔子和其弟子均有修習⁵。

五經與儒家關係密切，普遍認為這五本書均由孔子修編成書，為儒者「內聖外王」必修之術。這五本書涵蓋文學、歷史、禮儀和宇宙觀，既可薰陶情操，又能培養個人鑑古知今和是非判斷的能力。三代聖人的事蹟，為儒者提供了行為規範，尚賢思齊，潛移默化之下，自然而然地就能成就「君子」。

兩漢政府為甚麼推崇五經？

儘管孔子及後學也有提及其他典籍，但只有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易》和《春秋》五書被尊為「五經」，此無疑與其道德教化功能有關⁶。以下將逐一探討：

《詩》⁷

孔子認為「不學《詩》，無以言」⁸。《詩》又稱「詩三百」⁹，是中國最早的詩歌集。周有採詩制度，樂官採集民間歌曲，整理並加以配樂，讓周天子瞭解民情¹⁰，惟歌謠是口耳相傳性質，作者身份無從稽考。其成書時間不遲於公元前六世紀¹¹。《詩》的題材涉及農耕、婚嫁等習俗¹²，又有記錄貴族飲宴的情況¹³及周王室的宗廟祭祀¹⁴。

³ 三代即夏、商、周；聖王是指聖君禹、湯、周文王、周武王

⁴ 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：「世衰道微，邪說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懼，作《春秋》」

⁵ 徐復觀：《中國經學史的基礎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2），頁7

⁶ Michale Nylan. *Introduction to the Five Classics*, (New Haven: Yale University Press, 2017), p.12

⁷ 對《詩》的解讀到漢代有四家，《魯詩》、《齊詩》、《韓詩》三家統稱為「三家詩」，屬於今文學派，是官學課程；而毛亨和毛萇另立《毛詩》，是為古文學派。現時僅剩下《毛詩》和《韓詩外傳》，其他版本已經散佚

⁸ 《論語·季氏》

⁹ 「三百」只是約數，具體數目有加減

¹⁰ 《詩經》中的歌謠原本是能配樂歌唱的，但是樂譜已經散佚

¹¹ Michale Nylan. *Introduction to the Five Classics*, p.21

¹² 稱為風或國風，作者多為平民

¹³ 是為小雅及大雅，作者是貴族

¹⁴ 頌，較為莊嚴的樂曲，述祖先之德而求庇佑

¹ 董仲舒（公元前192年—公元前104年），西漢著名的經學家、思想家和政治家。他治學以公羊學為主，於景帝年間任為博士，於武帝時受賞識任江都相等職位

² 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

孔子對《詩》曾有此評註：「詩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『思無邪』」¹⁵，《詩》不但是合教育、諷刺為一體的作品¹⁶，聆聽音樂有安撫心靈、陶冶情操之效，可以促進修養，所以「詩之教」備受儒家推崇。

《書》¹⁷

子曰：「甚矣吾衰也！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」¹⁸，孔子尚古，尤其推崇周文，欲效法周公，所以有此感慨。那麼孔子是從何得知周的事蹟？那便是從《書》中習得。

《書》又稱《書經》或《尚書》，成書時間應與《詩》相若，作者不明。《書》為記言體，篇目以時代劃分，記述時期涵蓋夏、商、周三代，上起堯、舜，下至春秋時期的秦穆公，其內容主要記錄君主事蹟、君臣之間的對話，有勸戒之辭，也有謀議、戰爭的動員和誓師。

《尚書》在漢發展成三家：「歐陽氏學」、「大夏侯氏學」和「小夏侯氏學」¹⁹。武帝年間，三家均為博士，授今文版《尚書》。惟三書現已失傳，只能從熹平石經推測歐陽氏本的面貌。

學習《書》有助認識上古時期的歷史和政治思想，從上古賢王的身上學習君臣相處。將之列為「五經」之一，意味昭然若揭。

《禮》

「禮」包含一切儀式，也泛指莊重的行為，所以其不但是文化的載體，也有約束的功能²⁰。子曰：「上好禮，則民易使也」²¹，禮對個人修身，甚或國家統治均有巨大影響。

《禮》分為六大章節²²，每章均對應不同官職所作，記述其職能及規範、周代的行政機構及其管理模式，折射出一種理想的政治模式。西漢時本無其書，劉德²³得《周官》古文經後上貢朝廷，始有此書²⁴，又因荀悅²⁵與劉

歆²⁶更名才被稱為《周禮》。王莽²⁷志於重建周代政府管理架構，《大戴禮記》和《小戴禮記》²⁸均被納入太學課程內，教授諸生。

《禮》原本是周代的官制，但發展至漢《禮記》，官位的職能許多已被刪減，使其道德意味更為濃厚。剩下的諸如〈大學〉、〈中庸〉等章目更是直指進學成德、為人處世的辦法。

《易》

「易」即變化。孔子曾感嘆若生命再多數年，在五十歲讀《易》，此生就可以不犯大錯了²⁹，這足見孔子對《易》的推崇。古有「三易」的說法³⁰，但《易》的成書時間不明，作者也無法查考。前兩本已失傳，只剩下《周易》³¹。因為《易》是一本占卜書，所以免於秦火，是「五經」中保存得最良好的作品。

《周易》內容玄妙無窮，涉及天文曆法，接通於「道」³²，有趨吉避凶之效。當中有六十四卦，每卦的經文分為符號和文字兩部分³³。因為《易經》晦澀難懂，所以後人作傳解釋。《易傳》的內容分七個部分，共十篇，故稱「十翼」³⁴。

《周易》是卜辭³⁵，體現占卜的平民化³⁶，透過隨意投砸就能得到一個隨機爻（音：洵）象，翻查《易》便得出答案。先秦諸子都認為自己的學派最合於「道」，這個道不但是人世的「道」，比如為政道、人道，更是接通一種冥冥中的神奇力量——世界的規律。未必所有事情都有答案，想不通時，知識份子就會訴諸形上答案。

雖然漢初的思想形態在黃老道家與儒家間拉鋸，但《易》是兩家都會修習的學問。將之列為「五經」，是因為其具神奇的指引性，對知識份子有巨大的吸引力。

¹⁵ 《論語·為政》

¹⁶ 《毛詩·序》：「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」

¹⁷ 《書》和《詩》、《禮》和《春秋》均不能倖免於秦火，不過當時有一知識份子——伏生將《尚書》藏於壁中，保留了下來，是為今文經。不幸的是遭受戰亂和社會動盪，《書》在漢初僅剩下二十餘篇，伏生在齊、魯之間教學，而後來成為尚書博士的歐陽生和張生都是師承伏生。見班固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「秦燔書禁學，濟南伏生獨壁藏之。漢興亡失，求得二十九篇，以教齊魯之間」

¹⁸ 《論語·述而》

¹⁹ 班固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：「訖孝宣世，有歐陽、大小夏侯氏，立於學官」。「歐陽氏學」、「大夏侯氏學」和「小夏侯氏學」的作者分別是歐陽高、張生弟子夏侯勝和夏侯建

²⁰ 《論語·雍也》：「子曰：『君子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！』」

²¹ 《論語·憲問》

²² 《禮》又稱《周官》、《周官禮》和《周官經》，有《天官冢宰》、《地官司徒》、《春官宗伯》、《夏官司馬》、《秋官司寇》、《冬官考工記》六章

²³ 劉德（公元前160年代—公元前129年），西漢宗室，封河間王，謚獻，是為河間獻王

²⁴ 班固《漢書·景十三王傳》：「恭王初好治宮室，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，聞鐘磬琴瑟之聲，遂不敢復壞，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」

²⁵ 荀悅（148年—209年），字仲豫，東漢末史學、儒學思想家、政治家

²⁶ 劉歆（？—23年），字子駿，改名劉秀，漢朝宗室，西漢末年及新朝官員及重要學者，協助王莽篡位，出任新朝高職「羲和官」，號稱國師，晚年卻因兒子被殺與誤信預言，謀叛事敗自殺。劉歆博覽圖書，精通經學，提倡古文經學，推動把《左傳》及《古文尚書》等古文經列於學官，引發漢代今古文經學之爭；他曾與父親劉向一同校閱宮庭藏書，編成目錄學的重要著作《七略》及《別錄》

²⁷ 王莽（公元前45年—公元23年），字巨君，西漢末年政治人物及權臣，之後篡奪皇位並自立新朝

²⁸ 另加〈月令〉、〈明堂位〉和《樂記》三篇

²⁹ 《論語·述而》：「加我數年，五十以學《易》，可以無大過矣」

³⁰ 《周禮·春官大卜》：「掌三易之法，一曰連山，二曰歸藏，三曰周易」。三易即《連山》、《歸藏》和《周易》

³¹ 有說《易》乃周文王所作

³² 世界的規律

³³ 黎子耀：《周易導讀》（北京：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9指出周人以天文曆法中的象數組織卦爻，有陽爻（—）和陰爻（- -）兩種。三爻構成一卦，有八種形式，是為八卦（乾、坤、坎、離、震、巽、艮、兌）；八經卦與八總卦相重，則得六十四卦

³⁴ 《象傳》上、下，《像傳》上、下，《文言》，《繫辭》上、下，《說卦》，《序卦》和《雜卦》

³⁵ 占卜的記錄

³⁶ 材料能在生活中找到，諸如蒼草、龜甲和銅錢

《春秋》³⁷

《春秋》是中國首部編年體史書，記錄從魯隱公元年（公元前722年）到魯哀公十四年（公元前481年）間魯國十二位君主的歷史，反映魯國的內政、外交、戰爭等大事。《春秋》所錄時期是東周前半部分，後來也因而命名為「春秋」。該書或由魯國史官集體編寫，或為孔子作品³⁸。

《春秋》所記時間清晰，每篇都是按照年份、季節、月、日排序，先記時間再以短句敘事。這種書寫模式被稱為「春秋筆法」，其不直接表達態度，反而在選材、用字等方面委婉表示。漢武帝在「五經」中尤其偏愛《春秋》³⁹，令《公羊》成為西漢的官學；宣帝則偏愛《穀梁》，其與《公羊傳》出現分庭抗禮之勢。

《春秋》是歷史書，也蘊藏作者的價值判斷，所以具道德意味，儒者閱此可以明是非，知善惡，故不作與身份衝突之事。

小結

「五經」是把五本儒家典籍列為經典，在太學教授經書的目的是培養生員的全人發展：《詩》溫柔敦厚，有薰陶情操之效；《書》尚友古人學習為政之道；《禮》釐明職責，培養德位相稱的人才；《易》內容奧妙，通於「道」；《春秋》明是非，重思考。「五經」系統發展至後代已經不限於五本，到了明代甚至有《十三經》⁴⁰。「五經」的設立無疑提高儒家的地位，令其在諸多學派中脫穎而出，「經學」在漢以後更成為中國學術的正統。

文 物與五經

(一) 海昏侯墓

海昏侯墓位於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區大塘坪鄉觀西村墾墩山，是漢廢帝劉賀的陵墓。劉賀是漢武帝的孫子⁴¹，由於宣帝無後，所以霍光改立昌邑王劉賀為漢帝，但其在位僅僅27日被廢⁴²，後被改封為海昏侯⁴³。



海昏侯劉賀印外觀
(圖片來源：Wikimedia Commons)

³⁷ 《春秋》所記之事言簡意賅，所以後有百家作傳解，分別為《左氏傳》、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、《鄒氏傳》和《夾氏傳》。《鄒氏傳》和《夾氏傳》現已缺佚，而《左氏傳》、《公羊傳》和《穀梁傳》被合稱為「春秋三傳」。有說《左氏傳》是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，所以又稱為《左傳》，是古文經，以敘事為主；《公羊傳》和《穀梁傳》是今文經，以解經為主。有說《公羊傳》作者為戰國時期的公羊高，而《穀梁傳》作者傳說為春秋時的穀梁赤。兩傳共同點在於以問答形式解讀《春秋》，然後判斷當中的微言大義。

³⁸ 徐復觀：《中國經學史的基礎》，頁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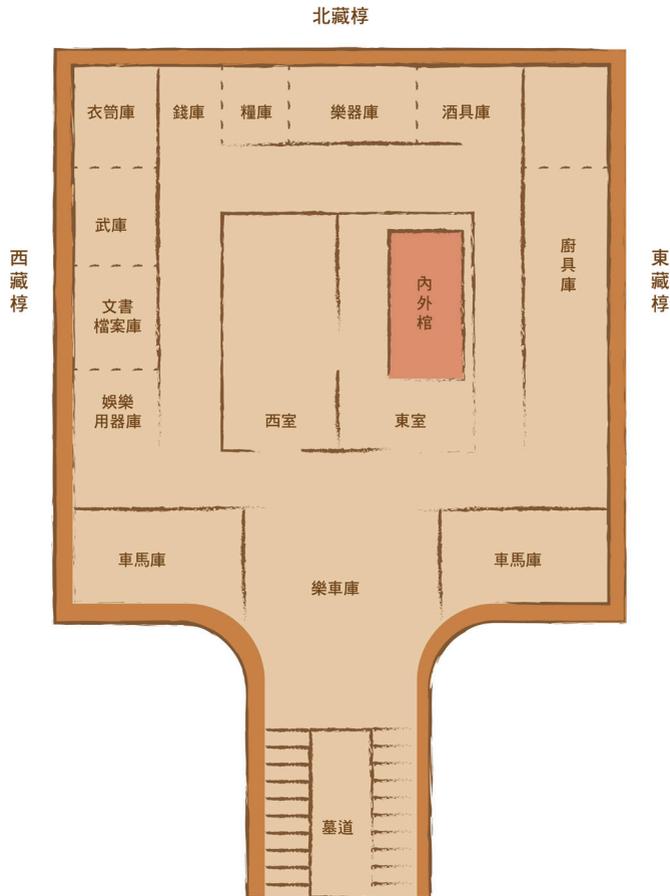
³⁹ 班固《漢書·儒林傳》：「漢武帝時尊公羊家，詔太子受公羊《春秋》，由是公羊大興」

⁴⁰ 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公羊傳》、《穀梁傳》、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爾雅》和《孟子》

⁴¹ 《漢書·諸侯王表》：「昌邑哀王薊武帝子。天漢四年六月乙丑立，十一年薨。始元元年，王薨，十二年，徵為昭帝後，立二十七日，以行淫亂，廢歸故國，予邑三千戶」

⁴² 《漢書·宣帝紀》：「元平元年四月，昭帝崩，毋嗣。大將軍霍光請皇后徵昌邑王。六月丙寅，王受皇帝璽綬，尊皇后曰皇太后。癸巳，光奏王賀淫亂，請廢。語在賀及光傳」

⁴³ 《漢書·宣帝紀》：「三月，詔曰：『蓋聞象有罪，舜封之。骨肉之親絜而不殊。其封故昌邑王賀為海昏侯。』」



海昏侯墓墓室平面圖
 (重繪圖，圖片來源：中國文化研究院：〈千古大墓——解構海昏侯墓〉，網址：<https://chiculture.org.hk/tc/china-five-thousand-years/4386>)

該墓自2011年開始發掘，為近年中國考古最重要的發現之一。墓中出土一萬件文物，當中有五千多個簡牘，許多是西漢時期的文獻，內含五經之三：《詩》、《禮》及《春秋》，且有不同版本及其註釋⁴⁴，又有一面鏡屏。該屏特別之處在於背後有儒家師徒的圖畫，這是現有最早的孔子畫像，故學者暫稱為「孔子衣鏡」⁴⁵。

我們從海昏侯墓發現甚麼？

直到東漢蔡倫改進了造紙技術，紙才開始廣泛成為文字的載體。由於海昏侯劉賀是西漢人，在蔡倫之前，其墓穴發現的簡牘便是當時主要的書寫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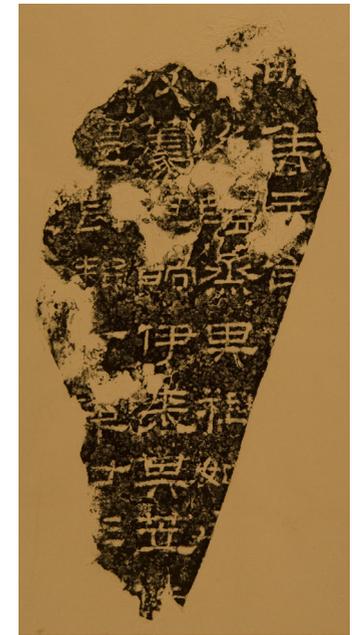
竹簡厚重，不便攜帶，抄錄麻煩需時，平民不可能擁有五千多卷。劉賀墓出土的竹簡數量龐大，一方面證明墓主人身份高貴、富裕且喜愛閱讀；另一方面，「五經」有三本被書於竹簡，反映「五經」的風行程度，即使是曾為漢帝的劉賀也將此收於墓中，足見「五經」的重要性。

墓中發現的「孔子衣鏡」呼應上文的說法。孔子是儒家的開創者，生前因為政治失意所以辦學廣收門徒。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，諸侯均行霸道，主張王道的儒家學說並沒有凌駕的地位。然而，在漢廷實行獨尊儒術的政策，大力提倡以五經授課，孔子乃至儒家的地位大為躍升，海昏侯墓中「孔子衣鏡」的存在就是有力的證據。

(二) 熹平石刻



熹平石經
 (圖片來源：Wikimedia Commons)



熹平石經拓片
 (圖片來源：Wikimedia Commons)

⁴⁴ 楊軍、徐長青：〈南昌市西漢海昏侯墓〉，《考古》，2016年07期，頁61

⁴⁵ 同上註

太學

(一) 太學成立背景

武帝建太學絕非一時興起，當中有許多社會政治考慮。為了能長治久安，漢初文人積極反思秦速亡之由，得出結論：秦焚書坑儒、不重學風、暴力統治，導致社會缺少道德教育，難以穩定人心⁴⁷。從漢開國至景帝年間，君主貫徹輕賦稅、重農業，與民休息的政策，國家累積財富⁴⁸。漢景帝肅清七王之亂⁴⁹，武帝更憑藉中央集權完成國家的大一統。興辦學校需要眾多資源，父輩的努力耕耘，無不為武帝的「文治」奠下基礎。

武帝即位之初就有許多大臣上疏復興儒學⁵⁰，不過竇太后⁵¹阻撓，未能成事。直到元朔五年（公元前124年），思想及文化與道德教育的貧乏，不利統治與國家發展，亦為了避免重蹈秦窮兵黷武的覆轍，武帝便採納董仲舒與公孫弘⁵²等人的提議，於長安建設中國史上首個官辦教育機構——太學。除了《詩》和《春秋》被選為課程，更另設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易》，由「五經博士」教授儒家經學，為政府培養人才⁵³。

(二) 太學的發展怎樣反映兩漢歷史？

太學建於元朔五年，漢武帝在長安設立校舍，收生員五十人。西漢後期至東漢前期太學發展迅速，由於漢廷重視辦學，因此太學收生規模不斷擴張。從武帝時期的五十人，發展至昭帝時期的百人，元帝時期的千人；到成帝末年，太學收生已擴展至三千人⁵⁴。由於生員數目龐大，王莽在平帝時期開始擴建校舍，令太學規模足以容納萬人，史稱「築舍萬區」⁵⁵。

⁴⁷ 賈誼《過秦論》：「及至始皇，奮六世之餘烈，振長策而馭宇內，吞二周而亡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執捶拊以鞭笞天下，威振四海……於是廢先王之道，焚百家之言，以愚黔首；墜名城，殺豪俊，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陽……」

⁴⁸ 司馬遷《史記·平準書》：「至今上即位數歲，漢興七十餘年之間，國家無事，非遇水旱之災，民則人給家足，都鄙廩庾皆滿，而府庫餘貨財。京師之錢累巨萬，貫朽而不可校。」

⁴⁹ 七王之亂（七國之亂），發生於公元前154年。當時以吳王劉濞為中心的七個劉姓宗室諸侯：楚王劉戊、膠西王劉卬、膠東王劉雄渠、淄川王劉賢、濟南王劉辟光、趙王劉遂，由於不滿朝廷實行削藩政策，剝奪地方諸侯權力，所以興兵反抗，最終為竇嬰、周亞夫所鎮壓。

⁵⁰ 班固《漢書·武帝紀》：「建元元年冬十月，詔丞相、御史、列侯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諸侯相學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。丞相綰奏：『所學賢良，或治申、商、韓非、蘇秦、張儀之言，亂國政，請皆罷。』奏可。」

⁵¹ 竇太后（公元前200年代—公元前135年）為漢文帝皇后、漢景帝生母、漢武帝祖母。竇氏掌握政權橫跨景帝、武帝兩代，主張「無為而治」的黃老之術。

⁵² 公孫弘（公元前199年—公元前121年），字季，武帝時曾擔任御史大夫、官至丞相，封平津侯。

⁵³ 《詩》和《春秋》在景帝時已置博士。章權才：《兩漢經學史》（臺北：萬卷樓，1995），頁86。

⁵⁴ 班固《漢書·儒林傳》：「昭帝時學賢良文學，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，宣帝末增倍之。元帝好儒，能通一經者皆復。數年，以用度不足，更為設員千人，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。成帝末，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，今天子太學弟子少，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。」

⁵⁵ 班固《漢書·王莽傳》：「是歲，莽奏起明堂、辟雍、靈臺，為學者築舍萬區，作市、常滿倉，制度甚盛。」

甚麼是熹平石經？

熹平石經是作於東漢熹平四年（175年）的刻石，共四十六碑，高十尺，寬四尺，共二十餘萬字，立於東漢首都洛陽太學門外⁴⁶。遺憾的是，刻石多受損壞，現存百餘塊殘石存於中國各大博物館。

自武帝始「五經」成為官學，然而秦火與戰爭令五部經典散佚，時人依靠記憶背誦出來，是為今文經。後經書的原版（古文經）相繼出現，且在社會流傳。學者爭辯何者為正確，所以有古文經和今文經之爭。漢廷擁立今文經，以此為太學的教材，設五經博士教授。

至東漢時，「五經」已廣泛流傳，但是經書反複抄寫，文字多有錯漏。所以在靈帝時期，朝廷便校訂經文，將之刻於石碑，因此產生了熹平石經。是故石經記載了「五經」名稱及東漢時期官方認可的版本。除了「五經」，石經亦包括《公羊》、《儀禮》等與五經相關的典籍。

小結

無論是西漢海昏侯墓還是東漢熹平石經都有「五經」的記載，可見「五經」具官方認可，是極為重要的官學典籍，在兩漢有超然的地位。

⁴⁶ 范曄《後漢書·儒林列傳·序》：「熹平四年，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，刊於石碑，為古文、篆、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，樹之學門，使天下咸取則焉。」

時至東漢，漢室遷都洛陽，建武五年，光武帝劉秀在洛陽新立太學。明帝時期，皇室、諸侯及大臣之後代均修經學⁵⁶，且另立「四姓小侯學」⁵⁷，吸引不少民族慕名而來⁵⁸。

東漢和帝以後，外戚、宦官擅權，政治不利因素導致太學衰敗。安帝時期學風敗壞⁵⁹，順帝中興，力挽狂瀾擴大校舍⁶⁰，廣招生員，令學生數目激增至三萬餘人⁶¹，但是時太學已無儒者之風⁶²。桓靈時期，敢言的太學生因「清議」公開抨擊宦官專政，而得罪宦官集團，引致兩次黨錮之禍，大批學生被終身囚禁或誅殺⁶³。靈帝受唆擺設立「鴻門學都」制衡太學，令太學地位下降。漢末的黃巾之亂和州牧割據，使社會不穩、政治黑暗，嚴重影響太學運作，最終更令教學終止。

(三) 太學的教學模式與授課內容

「博士」是教導「五經」的專職學官，所以又名「五經博士」，他們是經學的專家，在太學擔任老師的職責。太學學生，在西漢稱為「弟子」，而東漢則稱為「諸生」。武帝時太學只有五十個學額，篩選條件是「年十八以上，儀狀端莊」的官宦子弟⁶⁴，而地方地主子弟也可作為旁聽生，是為「受業子弟」。前者有官祿、免役，而後者則要費用自理⁶⁵。

太學的授課形式和現代大學相似，學生以自修為主，大班教導「五經」的正課。光武帝設十四名博士分別教授今文經⁶⁶《施氏易》、《孟氏易》、《京氏易》、《梁丘易》、《歐陽書》、《大夏侯書》、《小夏侯書》、《魯詩》、《齊詩》、《韓詩》、《大戴禮》、《小戴禮》、《嚴氏春秋》和《顏氏春秋》⁶⁷。正課以外時間，學生可以按個人興趣學習，他們既可以請教校外名師、高足弟子⁶⁸，也可以和同儕互相交流⁶⁹。太學不設畢業年限，但學生必須通過考試才可以授予官職，所得的成績和所分派官位相等⁷⁰。

總結

太學既是學府，也是一種仕途機制，學子進入太學的目的是謀求官職，以「五經」為課程，旨在培養德位相稱的預備官員。

太學的發展與漢的盛衰互為因果。一方面，漢廷重視教育令太學發展蓬勃，但社會因素也會影響太學運作。另一方面，太學的設立推動了社會學習風氣，學子修讀經典可陶冶性情，因此這個與仕途緊扣的制度也培養不少政治人才。學生居住在校舍與同儕協作，促進彼此交流，一同進學修德，無疑是兼具個人與群性發展。然而，這個制度並未完善，只教授儒家學說難免予人「統治者將個人思想移植於儒家經典，並將統治措施合理化於聖人之言」的猜想⁷¹。不僅如此，博士數目遠遠追不上學生人數，只能由弟子高足助教，難免影響教學質量。

⁵⁶ 袁弘《後漢紀·孝和皇帝紀下卷第十四》：「永平中，崇尚儒學，自皇太子，諸王侯及功臣子弟，莫不受經」

⁵⁷ 袁弘《後漢紀·孝和皇帝紀下卷第十四》：「外戚樊氏、郭氏、陰氏、馬氏諸子弟立學，號曰四姓小侯」

⁵⁸ 范曄《後漢書·儒林列傳上》：「其後復為功臣子孫、四姓末屬別立校舍，選選高能以受其業，自期門羽林之士，悉令通孝經章句，匈奴亦遣子入學。濟濟乎，洋洋乎，盛於永平矣」

⁵⁹ 范曄《後漢書·儒林列傳上》：「自安帝覽政，薄於藝文，博士倚席不講，朋徒相視息散，學舍積敝，鞠為園蔬，牧兒糞豎，至於新刈其下」

⁶⁰ 范曄《後漢書·儒林列傳上》：「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，千八百五十室」

⁶¹ 范曄《後漢書·儒林列傳上》：「本初元年，梁太后詔曰：『大將軍下至六百石，悉遣子就學，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，以此為常。』自是遊學增盛，至三萬餘生」

⁶² 范曄《後漢書·儒林列傳上》：「然章句漸疏，而多以浮華相尚，儒者之風蓋衰矣」

⁶³ 范曄《後漢書·儒林列傳上》：「黨人既誅，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，後遂至忿爭」

⁶⁴ 晉文：《漢代太學淺說》，《山東師大學報》（人文社會科學版），2001年第6期，頁75

⁶⁵ 同上註

⁶⁶ 與古文經相對。古文經在秦始皇「焚書坑儒」及咸陽被攻陷之後所起的「秦火」大量缺佚。因此依賴時人口耳相傳，重新默寫出來，這個版本就是今文經

⁶⁷ 范曄：《後漢書·儒林列傳上》

⁶⁸ 高年級學生

⁶⁹ 晉文：《漢代太學淺說》，頁76

⁷⁰ 同上註

⁷¹ 林曉希：〈近三十年來漢代經學研究述評〉，《雲南社會科學》，2014年05期，頁27-31 朱日耀：〈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結構及其特點〉，《政治學研究》，1987年06期